

修正的“分裂”中那枚社会的“毒胶囊”

陈方

“毒胶囊”丑闻被曝光，一些为修正药业代言过的明星也跟着遭了殃。微博里，很多网友对修正药业广告中的“全明星”进行了炮轰和内容再生产。比如明星张丰毅代言修正斯达舒的广告语“良心药，放心药，选修正药，管用的药”，被改为“黑心药，坑爹药，专注皮鞋30年。”影星陈建斌代言的修正六味地黄胶囊，广告词“胶囊，就一粒！”网友戏称：“这个只能一粒啊，多了怕出事啊！”

所谓“良心”药企的形象彻底坍塌了，代言明星们也一同被公众问责了。平心而论，明星们也不是一点儿责任没有。在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屡屡发生的背景下，名人在代言广告时，应该更加慎重。不过，话说回来，连专业的监管部门对“毒胶囊”都是“后

知后觉”，公众怎么可能指望那些明星们对“毒胶囊”先知先觉？

与之相比，我更感诧异的是，修正药业在成本投入上所呈现出的“分裂”让人难以理解。据媒体披露，铭达标的药用胶囊每一万粒的价格是60多元，如果铭不达标的药用胶囊价格还会便宜一些，大约要四五十元一万粒，两者相差不过10多元钱，折合到一粒胶囊大约是一厘钱。恰恰正是因为这一厘钱的利润，一些药厂宁愿选择相对便宜的铭超标胶囊。

修正硬胶囊的生产线有4条，一条生产线一天生产24万粒，一天就是96万粒。如此核算，修正药业一天可节省大约5000元，一月就能节省15万元。这15万元在普通人看来数额不小，但与修正药业在广告投入方面的成本相比，“毒胶囊”节约的成本简直

是九牛一毛。

有网友列举了明星为修正药业代言的广告费用，其中孙红雷两年的代言费是400万元，张丰毅两年代言费300万元，陈建斌两年代言费280万元。据相关媒体测算，仅今年3月份，修正药业的广告投放高达3亿元左右。

一方面是不惜血本投放广告，另一方面却为了节约区区几厘钱成本，不惜放弃胶囊质量，修正药业“成本投放”中的“分裂”让人震惊且愤怒！有人说这可能与修正药业的发展理念有关，修正本身的管理和经营理念存在隐患，技术力量不行，没有可圈可点的高端产品，只是纯粹靠广告拉动销售。而修正的领头人修涑贵是吉林最早利用广告来提升产品知名度的企业家。不得不说，修正今天的“罪过”与发展理念背

后畸形的价值观不无关系。

美国默克制药的缔造者乔治·默克曾说，“应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得越清楚，利润越大。”在救人与求利之间，修正当然选择了后者。即便是在求利之路上，其所看中的也并非产品的内在品质，因为内在的品质，很难一下子吸引人，而且需要付诸时间成本长期培育。但外在的名气，却可以花钱大造声势。修正药业太明白“眼球经济”时代，知名度胜过一切的道理了。事实上正是如此，铺天盖地的广告，为修正换来了疯狂增长的业绩。2009年时，修正销售收入为115亿元，2010年时修正药业销售额就突破了171亿元，增长率高达48.7%。

铭超标的胶囊是“毒胶囊”，那么药企心中“只求利不救人”的价值观，何尝不是一枚无形的“毒胶囊”？而且，正是在后者的药力发作下，生产线上才生产出了一批批“毒胶囊”。

不遵守基本的道德底线，不诉诸自我品质的提升，不敬畏内心世界的良知坚守，求名而不求实。修正药企“成本投放”中的“分裂”，是价值观中的“毒胶囊”在作祟，事实上，制药业之外，类似的软性“毒胶囊”随处可见。煤老板在安全措施方面吝啬到一毛不拔，可是在打点官员方面却一掷千金；一些学者在做学问上耐不住寂寞，在求知名度上却是下足工夫，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成本投放分裂”呢？

缺少了对内心良知的敬畏，缺少了对社会成本的约束，很多本应被严格尊崇的常识反而被扭曲了。修正药业“成本投放分裂”不过是现实社会的又一颗“毒胶囊”罢了。

冰点时评

有多少虚构成为历史

郭震海

提到《乌龙山剿匪记》读者都不会陌生，讲的是解放初期，湘西匪患严重，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剿匪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映后，因为故事生动曲折而热播不断，一度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该剧也成为了几代人记忆中的经典之剧。去年新版的电视剧，也再次受到观众的喜爱。

据《乌龙山剿匪记》的作者水运宪自己说，他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乌龙山”三个字只是一个虚拟的地名，作品也写得极其恣肆无羁。后来随着电视连续剧的反复热播，“乌龙山”这个莫须有的地名居然名扬天下。湘西的龙山县因为有个“龙山”两个字，便自诩是道中正宗。该县有个很长的峡谷，原名“皮渡河”，索性挂牌改成了“乌龙山大峡谷”。20多年来，湘西老老少少看好了这个虚假地名，当地烟厂出“乌龙山牌”香烟，酒厂生产“乌龙山牌”芭谷酒。有一家颇有特色的餐饮企业，取名“乌龙山寨”，若干连锁店开到了省城。

《乌龙山剿匪记》剧组的一个成员，20多年后到湘西古城旅游。发现当年剧组所住的县武装部招待所依然还在，只是已改名为“乌龙山宾馆”。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演员中军谊当年住过的房间，门口赫然挂着一块招牌——钻山豹旧居。有一年水运宪到湘西某县参加会议，县委书记、宣传部长陪同参观旅游景点。旅游局长点了一名熟悉情况的女导游沿途讲解。穿过一个山洞时，导游指着对面的悬崖，认真地讲解：“上头有几间木屋子，那就是榜爷的故居。湘西剿匪之前，钻山豹、四丫头他们经常聚集在那里开会。那里面摆放的全是实物，珍贵得很呢，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县领导知道水运宪是《乌龙山剿匪记》的作者，一听导游这么一说，不免有些尴尬，赶紧打断她说：“莫乱讲，那些人物都是作家编出来的。哪里有什么榜爷嘛。”没想到导游非常执着，反驳领导说：“这您就不知道了。那个作家小时候也是从我们这里读书出去的。他们家的祖屋紧挨着榜爷，三代以前跟榜爷家还是有血缘关系呢。”

在《中国青年报》读到作家水运宪撰写的这篇文章后，感觉很好笑，笑过之后又感觉很荒唐。值得庆幸的是现在《乌龙山剿匪记》作者说出了真相，如果他没说出去真相呢？我作为一个不知情的游客到了该地旅游，或者是我们的青少年到了该地旅游，听导游的生动介绍，看陈列的“实物”，肯定会信以为真。

像这样把虚构的东西演绎成现实，或者说演变成历史的相信还有很多。借助某一部文学作品或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发展当地旅游业，确实是一种促销手段，无可厚非，但如若以假乱真，甚至以讹传讹，不免有失分寸。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现在的电视剧，从宫廷戏到间谍戏，到战争戏，层出不穷的戏说、歪说到穿越。过去对一些虚构的影视作品还标有“纯属虚构”等提示，生怕观众误解，现在全省略了。一次，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对我说，现在给学生讲历史课费劲儿多了，一些学生老拿虚构的影视作品往里面套，讲半天学生们都不信，现在的影视作品如果是虚构的为什么就不能提示清楚呢？这样肆无忌惮地发展下去，与篡改历史有什么区别呢？

邓聿文

“毒胶囊”事件正在中国扩大，目前已查封7700多万毒胶囊，逮捕9人，刑拘45人，包括一些地方的监管者。人们固然希望企业和资本讲道德，但既然资本本愿为暴利冒被杀头的危险，在利润面前，道德也就不过是利润的“婢女”。因此，要使企业和资本讲道德，作为公权力的监管部门的严厉监督就必不可少，包括对敢以身试法者“杀无赦”，看看他们是否真有勇气不怕杀头。

由此来看，若不时曝出各种骇人听闻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就不能仅仅把责任



如此错

一起三死两伤的交通肇事案件，在受害人家属没有得到赔偿的情况下，河南省陕县人民法院却以被告人“积极赔偿”为重要依据，对肇事司机做出减轻处罚的判决书。判决与事实不符，主审法官称是因为“眼睛花”判错了。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目前，这位法官已被停职接受调查，案件将于近日再审。（中国广播网4月23日）

漫画：徐简

“手捧断指”疼在所有人身上

李家伟

近日，江西南昌的一位农民工在上工时手指被钢筋打断。在医院治疗后，因囊中拮据中止治疗。工厂老板接到求助电话时推脱很忙，农民工因负担不起治疗费用，手捧断指离开医院。（《北京晨报》4月22日）

2009年，河南新密市一企业工人张海超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取得了去做正式鉴定的机会，但郑州职防所为其做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28岁的他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坚持“开胸验肺”，用一个人的无奈之举，揭穿了谎言。如今，“开胸验肺”已经有了自己的“百度百科”，成为我们社会肌体上一块永远的伤疤。

但令人悲愤的是，在缺少了制度关怀的背景下，类似的事件竟然仍在继续上演。当那位受伤的农民工“手捧断指离开

医院”时，不能说，他离去的背影深深刺痛了我们。

有报道中说，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末，江西省农民工达到733.7万人，在省内就业的有220.86万人。截至目前，仅有106万人参加工伤保险。又有专家建议说，在向企业宣传参加工伤保险的同时，要加强农民工有关法律和条例的普及，提高其法律维权意识，规范劳动关系。但像“700余万农民工仅有百余万参保”这样的现实，靠“专家”开出的这个“药方”显然不能“治本”。“向企业宣传”的成效会如何呢？靠给企业的经营者们讲一讲人生的道理、人间的温暖，放两段“感动中国”的视频？“提高农民工法律维权意识”更像是一张画在空中的大饼，一边画一边还怪那些吃不到嘴里的人：这么好的大饼你怎么就咬不到呢？

最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谁都不要忘了，那腾升的统计数字里，也包含了那些如蚂蚁般默默劳作的普通民工们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

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优势下，我们迅速取得了经济上的“改天换地”，但这样的进步却无法取代深层次的全面的社会进步。即便只从经济角度而言，这样的“优势”能够保持多久都是一个问号！

一个正常的社会下，一个人的伤口不只与这个人自身有关，一个人的疼痛同样疼在所有人身上。只因有这样的目标，才会有对人类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守望相助。即便我们盖起了再多大楼，出口了再多货物，制造了再多繁华，即便我们的汽车再多，动车再快，但只要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靠自己双手维持生计的人“手捧断指”离开医院，我们都无法毫无愧色地自认为已经加入到文明社会当中。

我想，等到了有一天，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有着怎样的收入，都能安心地走在大街上，心里是一份安定与从容，脸上浮现的是体面与尊严，等到了那时候，我们在经济、物质上的追求才会拥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吴英案与搞活民间金融不能混为一谈

周俊生

折腾了5年之久的吴英案，日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不核准浙江省高院的死刑判决，该案现已发回原审法院重审。虽然原审法院还未进行重审，但一个可以预料的结局是，吴英这个震动全国的“知名人物”，应该能“免死”了。

围绕着对吴英的死刑判决，自2009年4月在浙江金华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议。今年1月，浙江省高院作出维持死刑的二审判决后，争议更是激烈。在反对判决吴英死刑的意见中，有人认为吴英毕竟不是暴力犯罪，没有危害他人生命，判处其死刑不符合当下社会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生命至上的司法理念。但更多的人则认为，吴英案的出现，是长期以来我国过于严格的金融管制政策的产物，由于民间信贷需求得不到国有银行的支持，特别是对利率的严格管制，导致利率较为灵活的民间集资更受欢迎。这一观点，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

我国的金融体制确实存在着管制过于

严格的问题，其后果便是信贷市场成了国有银行的一统天下，信贷投放也基本流向国有企业和极少数发展较好、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市场地位的民营企业，大量默默无闻的中小微企业无法得到银行信贷的支持，其持续经营能力越来越差。

这种不适应经济运行实际状况的金融体制，当然需要改革的。近几年来一些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对开放民间金融市场产生了迫切要求，这种呼声最近得到了政策面上的响应，搞活民间金融也成为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选项。在这个节点上，吴英案被视为过于严格的金融管理体制的产物，很容易得到舆论的认同，以至有人在网上高呼：“救吴英就是救我们自己。”

但是，就吴英案的性质来说，显然不能与目前所倡导的搞活民间金融混为一谈。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其目的在于利用民间资金的活力，来支持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微企业，让地方上的实体经济能够得到及时的输血。这种借贷只要严格遵守基本的规则，即使借贷企业出现

问题，由于其集资额通常不会太大，因此不会蔓延成影响整个地区的社会问题。但是，吴英所从事的借贷活动却并非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说得很清楚，她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集资款更多的是购买豪车豪宅和用于个人奢侈消费，甚至向借贷人编造谎言骗取他们的信任。吴英在在所获罪名“非法集资罪”可能存在争议，但其所从事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诈骗，则是确定无疑的。而诈骗行为，不仅为国家的金融管理体制所不允许，即使是放在目前搞活民间金融的背景下，也不能得到肯定。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对吴英死刑不核准的决定，体现了司法上的人道理念，无疑值得肯定，但这并不等于对吴英所从事的金融诈骗活动网开一面。最近一段时间，各地不断曝出一些诸如“美女老板”跑路的新闻，此类编造谎言欺世盗名，不计后果地向他人以高息承揽巨额借款的行为，应该加以防范。搞活民间金融，决不是给金融诈骗活动提供市场，相反，正是为了堵塞金融诈骗的活动空间。

明胶生产的全国四大基地之一。

固然，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来看，监管存在“无利不跑”、“脚踩难跑”等问题。现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模式，易造成监管真空，责任认定的模糊以及由此而来的责任推脱等；另外，监管者因经费福利的问题存在以罚代管现象，当违法企业成为其“衣食父母”时是不可能有效监管的。但在“毒胶囊”这件事上，笔者倾向于认为，造成监管真空的更本质因素是地方政

多些窗口意识 就会少些破窗效应

肖时候

武汉一名51岁的出租车司机张国贸，两年来一直在车内放置这样的承诺牌：75岁以上老人乘坐本车免费，有人陪同，车费减半，癌症病人全免。众多乘客得到爱心支持，“敬老的哥”走红江城。（《楚天都市报》4月23日）

这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小人物，以他自己的感悟与行动，主动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为老人分忧，为社会解难，着实难能可贵。像许多小人物一样，他们不是天生的伟大，但内心存有向善的温暖力量，一个契机便能催生绽放耀眼的道德光芒。如伸手接住坠楼女童的吴菊萍，车流中抱起小悦悦的拾荒阿婆。

不必说小人物带来大感动，不必说小人物抚慰了道德焦虑，也不必说小人物发自内心的行动上上升到公民精神之类，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没有任何功利或世俗的主题都显得多余，而且令人扫兴。

“本来就不图名，也没统计过具体有多少次打车费”“想着自己也在一天天变老”，这就是“敬老的哥”的动因，老吾以及人之老的大道理对他来说只是本能的同理心，惟一听上去有风格的话，就是“岗位虽小，也是城市的一扇窗口”。这话对他来说再自然不过，作为出租车司机，行业的“窗口”教育没少受，这观念也就根深蒂固。一个老老实实在的开车人，老

百姓说话

去了华西又如何

汪强

连日来，河南太康县高贤乡部分知情群众不断向《大河报》记者投诉，称该乡乡干部和全乡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以“外出考察”为名，用公款到外省旅游。该乡党委书记李凤杰否定说这“纯属扯淡”，称“去华西村考察新农村建设去了”。而记者调查证实，这些人员并未去华西村参观学习，而是去了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大河报》4月23日）

明明根本没有去华西，硬说去了华西，明明纯粹是旅游，却说成纯粹的考察学习，这确实有点离奇。不过，我又想，即使真的去了华西又如何？

以考察学习为名外出旅游，这样的事早就屡见不鲜。但像高贤乡这样，只旅游不考察，还确实不多见。通常的做法是也考察，也旅游，考察的时间少，旅游的时间多，考察是假，旅游是真。比如，既说去华西考察，且又去了南京、苏州、上海、杭州，那就绕一下路，先从南京到华西，再从华西去苏州。假如高贤乡也如此做，游览了华西公园，登上了华西的“长城”、“天安门”、“山海关”，能改变公费旅游

的性质吗？能给高贤乡人民带来什么好吗？

再退一步讲，高贤乡干部去华西确实是参观学习，了解了华西的过去、现在、未来，了解华西人的观念、做法，那就有用吗？据我的经验，参观这类典型时，往往是到现场时激动，回去后没行动。不行动还振振有辞：“人家华西在江南，我们高贤在河南，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一个在中国东部地区，哪有可比性呢？”“人家享受到特殊政策，我们没有特殊的政策可享受。”如果考察了几天，最后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那考察有意义吗？

我家在苏中地区，与华西相隔不远，乡村干部大多去过华西，但到现在为止，我的家乡并未出现华西那样的村，也没有出现吴仁宝那样的乡村干部。说得更坦率一点，好像并没有哪位从华西回来的干部，立志要向吴仁宝学习的，立志要将所在的乡村建设成华西的。

其实，真的要学华西，也未必要去华西；即使要去华西，也未必要去46人一起去华西。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就可以了解华西村的发展过程及基本经验，就可以知道吴仁宝的创业经历及先进事迹，为什么一定要去呢？

管产生两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在问题出现前，地方政府基于稳定税源的考虑，往往会优先选择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干预正常的监管，使得监管流于形式；二是在问题出现后，又出于保护产业的考虑，对问题企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量不使企业和产业伤筋动骨。它产生的一个消极后果，就是给企业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即出了事故后，政府都会给以保护，从而无形中放松了自我监管的要求。

一再发生的食品药品等人命关天的安全事故，提醒我们不能再抱着如此思路解决问题了。否则，势必会引起恶性循环，并对政府信誉的耗损也越厉害。

“毒胶囊”更多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归咎于无良企业，而更应该反思监管部门乃至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

以工业明胶的生产集中地河北衡水阜城县为例，早在2004年该地就已经被曝光一次，8年之后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只能说是地方监管不严和官员纵容的结果。因为人们看到，当工业明胶的生产厂家负责人企图一把大火毁灭证据时，竟是要当地一乡人大主席指使，可见在“毒胶囊”事件，资本和地方政府或至少是其中一些权势官员勾结之深。但可喜的是，该县副

县长竟然在记者面前大谈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是如何采取很多措施治理生产厂家的，并把监管难的责任归咎于这个行业投资小、门槛低、工艺简单，以及一些不法商人、不法经营者故意逃避执法部门的监督，见利忘义。

没有不法商人，要监管者何用？副县长长的“表功”，概而言之，只能说明当地政府采取的所有监管措施，不过是做表面文章而已。进一步分析，阜城地方政府监管不到位的真实原因，是当地已成为工业

府的政绩观出了问题。例如，假如阜城不是全国四大工业明胶的生产基地之一，很难想象，在前次事发后的7年多时间里，监管部门怎么会不知道企业用皮革废料生产的明胶被用于药厂！

当然，地方政府这么做也并非不可理喻，或者恰恰是理性的选择。对于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发展型政府来说，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等始终是政府优先关心和考虑的事项，但这样一来，势必使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发生“扭曲”，从而对食品药品